

戏·戏教·戏禁：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传统戏曲(二)：戏曲作为公共文化空间

周宁

《权力与想象：戏剧意识形态研究》

—

戏曲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意识形态的表现，在构成民间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构成了它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竞争与冲突关系。我们在社区公共空间的组织与集体信念想象的传播两个方面，讨论戏曲的民间意识形态功能。

中国戏曲产生于民间节日庆典与宗教祭典，从诗经时代到今天，民间演剧活动总离不开岁时节庆与迎神赛社的仪式。俞大纲教授说：“庆典和祭典中，戏曲表演为必备之典。我们不必远溯诗经或楚辞所描写的以歌舞来迎神送神的先民祭神仪式，只需稍加注意宋代民间的节日及神诞的演出，就可以明了百戏技艺表演与社祭庙会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戏剧的形成，蕴孕于百戏的诸般技艺，已成定论。进一步推论，中国戏剧有宗教性、社会性、娱乐性……”[1]

戏曲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意识形态的表现，活动于乡间与市井。是构成乡间与市井聚落或社区公共空间的重要组织方式。乡间主要见于各种岁时节令、庙会堂会之类的庆典与酬神祀鬼祭祖的祭祀活动。其中迎神赛社的戏俗最为著名。陆游《赛神曲》写宋代绍兴一带的酬神戏俗：“丛祠千岁临江渚，拜觐今年那可数。须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辄许。嘉禾九穗持上府；庙前女巫递歌舞。呜呜歌讴坎坎鼓，香烟成云神降语。”（《剑湖诗稿》卷十六）同时代的范成大《乐神曲》写苏州：“豚蹄满盘酒满杯，清风萧萧神欲来。愿神好来复好去，男儿拜迎女儿舞。老翁翻香笑且言：今年田家胜去年。去年解衣折租价，今年有衣著祭社。”（《石湖居士诗集》卷三）农人祭土地祈农祥，渔民办“渔船戏会”谢龙王，商人则祭城隍，搭台唱街戏，一年到头，岁时节令不断，酬神演戏不断，其中规模最大的可能是七月十五中元节举行的“盂兰盆会”，大演目连戏祭佛徒先祖，还有五月十三关圣帝诞辰演关帝戏。《嘉定县志》记光绪七年佛戏之盛：“俗好佞佛，春秋二季，迎神赛会，演戏出灯，几无虚日，争奇竞胜，呼朋引类，沉酣酒食。”《清嘉录》记苏州庆关帝生日“割牲演剧，华灯万盏”。[2]

乡间演剧是乡民们重要的社会生活形式，其组织方式恰好体现了所谓的乡

村公共权力的文化网络。不仅演戏在特定节日特定公共场所聚集起乡民，形成民间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也是专制社会统治阶层最为恐惧而三令五申禁止的），而且，演剧的组织形式也恰好体现出乡村公共权力的文化结构。

杜赞奇在研究中国农村公共权力问题时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概念，首先，任何文化的都是政治的，“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们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其次，文化网络，作为由乡民认同的一系列象征与规范，包括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根植于乡村的公共权力组织结构中，并赋予其权力以合法性与权威性。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力的组织体系，包括诸如市场与生产、宗族与宗教组织构成的，在朝廷或官府权力之外施展权力与权威的民间血缘与地缘性的权力机构。最后，民间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拓宽了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权力结构的视野，使人们注意到乡绅社会与儒家思想构成的官方的、大传统的意识形态之外的民间的、小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二者见的竞争与合作关系。[3]

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考察乡村演剧的组织形式，可以发现乡民戏剧的组织结构，发现建立在地缘与血缘基础上的乡村公共生活的支配主体实现其权力、巩固其权威的方式。日本学者田仲一成研究中国地方戏的演出的乡村组织结构，仔细分析了乡村地缘集团与血缘集团的演剧组织以及该组织的分化扩大的方式。他所总结的地缘集团演剧的标准类型为：

- 1、市场的村落联合演剧：以市场为核心结成的村落联合，在市场所在地的庙演剧，并兼祀神和宴客。有大市场的庙市演剧（一年二回，各约数日）和小市场的墟市演剧（十日一回，各一日）两种。运营的组织由掌握市场的地主团体、牙商和客商基尔特为中心所组成，以市场圈内各村落农民层的观剧费和釀金来维持。

- 2、共同体的村落联合演剧：共有水利等农业生产基础的村落联合，在水神庙、八蜡庙等场所以祈雨、逐蝗为目的的祀神演剧。组织的中心是各村支配地主层的联合体。

- 3、村落共同体演剧：作为村落内社庙或小庙农耕仪礼（春祈春报、祈雨逐蝗等），或村落共同体规约（例如：禁止乱伐共有山林规约、禁止污染水源

水脉规约、禁止盗采竹笋规约、禁止放牧牛羊践踏禾苗规约）缔约仪礼的祀神演剧。组织由村落内田土所有者（地主、自耕农）结成联合体，费用则依所有田土的面积分担。

血缘集团演剧的标准类型为：

1、